

第三章 网开一面

大逮捕

监号来了一个新犯人，是邹瑞亭，军统长春站离职的组长。我在督察处时，他与我往来颇为密切。1948年4月他从长春兑了许多款子去了北京，现在怎么又捕了回来？

邹瑞亭进屋来的时候，脚刚踏进屋内，把行李往地板上一放，两手便一举：请大家多关照！露出了家礼。坐下之后，他说他算完了。大家问他是什么官？ he说是军统局少校组长。大家笑了，说：“我们这屋有个督察长叫关梦龄的，他都没有事，你这个组长，不在话下。”

他认出我来，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说：“见到你真不容易，北京的朋友都说你被镇压了。长春市除了你还有谁？官大的多了，可是实际办事的你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能看到你，我对宽大政策不怀疑了。你胖了。”

我们俩坐下来谈起来了，他说：“1948年我到了北京，带了许多款，有几百两黄金，不成想被长春一个商人杨蔼祥骗去，没要回

多少。没有办法,我借了几个钱,开了一个煤铺,1950年到了天津,天津公安第十分局找我去谈话,叫我以灰色面目出现,一方面叫我做买卖,一方面叫我给他们做工作,戴罪立功。我只在长春认识一些人,这样,经过了十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点成绩也没有,于是便把我逮捕,由天津解到这里。我认为这回算完了,在小红楼的一个小屋子,我把手指咬破,在白衬衣上给我老婆写了一句话:瑞玉永别。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天津,她们还不知我被解到这儿。想不到你在这儿,我高兴极了。”

我问邹瑞亭,在北京都看到了什么人?长春的朋友都有谁到了北京?他说:“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在1948年11月从长春化装到北京,站上的总务组组长子浩跟他一块去的。当时我在天津,项迺光派子浩到天津找我,要他的那个白金杯。原来在长春的时候,项迺光交给我一只白金杯,叫我带到北京给他经营一下,这一次他派子浩索要,我没有钱便没给他。后来他们就飞走了。”

“督察处长张国卿与项迺光前后脚到的北京,在北京交道口老刘家住了一个礼拜,也坐飞机逃走了。”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力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长了,管不着他了?小人作风。

邹瑞亭是地痞流氓,日本特务腿子,给日本人抱孩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后来又给白俄当仆役,又学会了俄语。伪满于长春警察六分局当特务股长。六分局住了许多白俄,归他监视,作了许多罪恶勾当。光复后,花钱运动参加了军统外围。在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外勤督察员。有一次,派他去抓土匪,他不懂特务技术,叫门的时候,站在门的中间,手一敲门,里面“啪”地一枪,把他的右腿击伤,土匪没有抓着,自己先挨了枪子儿。谈起来真丢人。特务机关认为这种人没用,便放在一边不派他工作。他在医院把伤养好,一看没有人理睬他,又托人写了一封信调到东北。到沈阳后,他给军统局东北区秘书主任陈绎如行了贿,便派他到长春站工作。在长春站又行贿副站长袁士举,派他为少校组长。1947年春,因为

长春战事紧张，他私自逃到沈阳，擅离职守，长春站当时的站长王力，即刻把他开除。可是他仍与军统的大小特务勾搭，以后认识了项迺光，认识了我。投机倒把，坐飞机运黄金。娶了小老婆，对他母亲与大老婆置之不理。特别在伪满的时候，倚仗日特，强奸白俄女人，逮捕无辜人民。

这时从北京又解来了一个栗宗元，他是伪满长春“三张二栗”的“一栗”。倚仗日本势力胡作非为，他看中了哪家姑娘，便给这家打电话，叫这个姑娘于晚上什么时候到某某饭店，如果不去，明天就抓人，说是反满抗日，是思想犯。看中了一个京剧女演员，唱完戏，就用车拉到饭店过夜，不去？行吗？邹瑞亭说他看见栗宗元了。

栗宗元自己不能写材料，叫杨文昌帮着写。

杨文昌帮着栗宗元写材料，写了一天还未写完，我把杨文昌找来，对他说：“你先把他在北京认识的社会关系写出来，检举要紧，过去的罪恶先不忙写。”

于是杨文昌启发栗宗元写社会关系，检举隐藏的反革命。他检举了不少人。郭科长一看这些材料很高兴，我又对杨文昌说：“邹瑞亭与栗宗元二人都是伪满的特务，要他们互相交待罪恶，比他们单个儿交待还有成效。你对栗宗元说，邹瑞亭不够朋友，把你的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为了自己，就不管别人。这样一说，栗宗元受不了，就会揭发邹瑞亭。”

杨文昌果然对栗宗元这么说了，轻描淡写的一提，栗宗元便受不了了。

“邹瑞亭说我什么？怎么说的？”

“算了，提这个没用，我也是听犯人说的。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不与他一般见识。他的事你又不知道。”杨文昌再三“拦阻”。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多得很，我说，你给我写！甭客气。”

栗宗元把邹瑞亭的罪恶检举了不少，内中有的邹瑞亭已经坦白，有的没有交待。

接着我又对邹瑞亭说：“栗宗元与你有仇吗？”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只是吵过架又好了，怎么了？”

“他说你许多坏话，咳！这小子……”

“他说我坏话？我倒要检举他！在伪满时，栗宗元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不知道？他那个买卖怎么来的？还不是敲诈来的！16岁的小女孩他都强奸，缺德到家了……”

“算了，你要检举，就写材料。”

他说我代笔，写了许多栗宗元的罪恶。我给杨文昌一看，杨文昌说：“这两个小子，哪一个也活不了，有民愤。科长说有人控诉他们。”

“那就完了。”我下了结论。

小红楼各监房的门窗，大加修理，大部分都换了新门，安上新锁，比过去坚固多了。郭科长这些日子忙得很，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走，有些事，我报告给他，也不注意。我知道一定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月下旬的《人民日报》刊载：美特高佩洁和他妻子马瑞卿在天津被捕。高佩洁是美国特务机关任用的特务。他在天津利用一个皮货庄，与丹麦、美国间谍一起活动。在他住处搜出大小电台3部，密电本7本，还有美特发的照相机等。这是解放后破获的第一个大特务机构，国际特务组织。使人震惊。

高佩洁与我相识，他的老婆马瑞卿在长春也与我认识。他家住长春东三马路。1948年7月，他多次请我吃饭，我也多次到他家。那时，军统有人对我说：“高佩洁自称少将，说是给美国新闻处工作，美国新闻处在长春的时候，他与美国人有来往，现在美国人走了，他何去何从？别被他唬了，如果给八路做工作，那可上当了。”

我说派人从旁调查一下。这话被高佩洁知道了，他认识长春警察局长袁家佩和国防站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史祚炎，他托这两个人婉说，要见见我，请我关照，并以史祚炎的名义在高佩洁家中设宴。我去了，他对我说，他给美国情报机关做工作。1948年9月，我到他家，高佩洁对我说要到沈阳。我对他老婆说：“你们过解放区要

小心，共产党抓去了可要共妻的，那可不是玩的。”

“共产党把我抓去，我就自杀！”马瑞卿说。现在她被捕了，能自杀吗？这些人早晚都要落网，谁也跑不掉。

尚传道住一个单号，每天看书，吃小灶，犯人只有他一个吃小灶。早晨牛奶、面包、鸡蛋，中午一菜一汤，晚上一菜一汤，都是面食或大米饭。他什么也不写，似乎到这来研究马列主义而不是反省罪恶。一天我在看守所与宋所长谈话，郭科长也在。正赶这时，一个看守端一个方盘，盘里一碟炒鸡蛋、一碗黄瓜汤、三个馒头，这是尚传道的伙食。我说：“他什么也不干，吃这么好，现在东北吃黄瓜是稀罕东西。”

郭科长说：“你又馋了？回头给你也弄点吃。”

“我不吃，我吃炖豆腐就很好。”

“回头给你买包子，再买点酱肉。”宋所长说着骑车走了，不一会儿真买来了。郭科长叫我吃，他们谁也不吃。以后又把杨文昌找来，我俩把一斤酱肉，20个包子吃光了。

郭科长说：“政府对你们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对尚传道与对你们的要求也不同。他觉悟慢，叫他多反省一个时间，叫他自觉认识自己才行，不能勉强。”

督察处审讯室的审判员于文学也押在圆楼上。昨天小组长汇报，他是第一小组组长。会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说：“长春解放后，我逃到沈阳开了一个粮米铺，呆了一年，去冬被捕到这里，判刑7年，送到监狱。最后又从监狱解回公安局。”

我问他在沈阳还看见督察处的人没有？他说：“李贺民在沈阳蹬三轮，邢士林在沈阳开了一个电料行，贾英明在沈阳赋闲，去年冬天都被捕了，可能解到长春监狱。”

4月23日，圆楼上的犯人一律搬走，搬到小红楼。这一下，小红楼住满了。我搬到小红楼楼下七号。我们这屋有杨文昌、徐克成、李中候和我。

4月26日晚上，院内汽车不住地响。宋所长叫我们4个人搬

到圆楼。我们4个人，一屋一个，另外，马尚、沈重、王达生、栗宗元等人也一人进一个监号。我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心想，这是大逮捕。

楼下也押满了人。

这些人，我不认识。都是些什么人呢？楼上楼下押了五六百人。这个举动可不小！大概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能有这么多呀？

天亮时，我勉强地躺下睡了一觉。五点钟起来，坐着一屋子人，谁也不认识谁，互相看看都是陌生的。吃饭时更乱了，我装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拿筷子，也递给我一双，半碗白菜汤，一碗高粱米饭。吃罢饭都开始大便，厕所在屋内，一大便，屋里这个臭哇。

饭后，我开始活动，先问我身旁犯人的姓名，这时看守战士严厉训斥：不准说话！我心中有数，照样与附近犯人说话。我告诉坐在门旁的一个小孩说：“老弟，你在那看着点，看守的过来先咳嗽一下。我们谈话有什么关系？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缘的。”

“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锁，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叫作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人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荻，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

问题还不大。他又说：“我这个反革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是公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他没有什么特殊案情。

他戴上脚镣，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镣铐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第三天，抓来了王厚甫，他是我的组员，军统基干，戴着手铐。我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从哪儿来？”

“我从长春监狱来。”

“怎么回事？”

“人家说我在新疆参加了暗杀毛泽民的行动。”

我赶紧叮嘱：“我化名姓郭，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没关系，我这事与你没牵连。”

我一想,当年陈牧报复从共产党叛逃来的李文宣,就是派王厚甫在南关处决的李文宣。如果说李文宣当年是假投降,那么王厚甫打死李文宣就是一条血债。晚上我把毯子给他盖上,他在这屋住了两天就走了。临走我听他对宋所长说:“那个姓郭的是关梦龄,督察处的督察长。”过了“五·一”,天气热了,这屋子人多挤得难受。我在精神上倒很愉快,别人是住监房,我是在工作。是以工作人员的心情,在考虑怎样了解这些犯人的案情。我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没有重要的人犯。

第3号监房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犯人服毒了,说是吃了许多安眠药片,神志不清,很危险,由几个看守给抬出去了。服安眠药片,也不能是一片,要一二十片才能自杀。这么多的东西带在身上,怎么没有检查出来?这个人是在未被捕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不然,公安人员闯进屋去现藏能来得及吗?由此可见,这个人是个很危险的反革命,不是一般嫌疑分子。过了两天,肖审讯员提我出去,他说:“抓来一个刘天民,他不承认是督察处的,回头我把他提到这屋审讯,你在门上的玻璃小孔认一认。”我一看,正是督察处的额外上尉督察刘天民,高个子,黄脸,什么时候我也能认识他。

肖审讯员说:“这小子不想活,服安眠药片,怕处死。”

5月20日晚饭后,楼下有一些犯人调走。我听到叫“徐鸿如”这个名字,便一下子想起前些日子我曾替一个山东小伙子写检举材料,徐鸿如是内中的一个逃亡在长春的山东恶霸。呵,把他也抓来了。我一想,这回抓的人真多,大概不能只在这个地方押人,可能监狱也押了不少人。

大 镇 压

5月15日早上,看守战士把圆楼钉有黑色防空纸的玻璃窗都

关上了。圆楼的窗户可以看到大街。早饭后,我站起来,利用看守不在跟前,偷着向大街看了一眼:街上的人很多,有扛着红旗的,有拿着标语的……小孩子和青年学生唱着“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国人民力量大,把帝国主义连根拔……”

这时候,屋内漆黑,电灯打开了,看守把收音机也打开了。收音机不是播送新闻,而是播送一个旧京剧片子,《四郎探母》的一段,还有一个旧片子,也是京戏。声音不好听,来回地播这两个片子,我怀疑不是收音机,而是留声机。不一会儿,宋所长和王所长等人上楼来提人,每个监号都有几个人,我们这屋把胡荻和老董头提出去了,马尚、栗宗元,许许多多的人都被提出去了,有几十个人。栗宗元在临走的时候,一双便鞋拉下了,他还回来取的鞋。人提走了,屋内仍播送那两段难听的京戏……

我坐着一声不响,看守来回巡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大街上有喊口号的,但听不清喊什么。我心想,可能是枪毙人,但也不能枪毙这么多呀?这屋的老董头,他说开饭馆,实际是开妓馆的,把他也提走了。胡荻是建军的,昨天夜里还提他问话,问他:“这次把你抓来,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谈,言者无罪。”

胡荻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论职位,予以办理……”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汉奸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抓。这张布告一出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没有跑,自己都认为没干什么坏事。结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汉奸都抓了。汉奸被抓之后,在看守所说:“咱们被那张布告骗了。”

现在呢,这些人响应坦白从宽的号召而自首登记了。如果没有这个号召,有的人早就跑了。胡荻说的话,我同意一部分。昨天还

问他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枪毙了，这种作法谁也意料不到。这样也好，在最后几分钟才知道被枪毙，减少许多苦恼，如果说要枪毙这个人，头十天就告诉他，这个人有多难过呀。1946年，“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汉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绪民谊、林柏生、陈公博等人死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许找律师辩驳，最后才执行枪毙。被宣判死刑尚未执行，那心情不堪设想。

晚饭，黑窗户才打开，我再一看大街，没有人了。这个大风暴过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汇报，我进屋一看，桌子上有张报纸，我想看看，被王所长拿过去收了起来。王所长与宋所长问我号内的反映，我说：“大家不知什么，有人猜是开大会，但不知道什么大会，有人认为枪毙人，我也这样认为。”

别的号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有人说，这回被抓的都危险。因为抗美援朝一紧张，就要安定后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该倒霉了。

我想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一些反革命也施行大镇压，强调安定，毫不留情地杀反动派。现在，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一样。如此说来，今天杀人是按照列宁的做法执行的。自己会不会被杀掉呢？没有把握。比如栗宗元、马尚，他们二人与我一样分在各监号，给政府反映情况，夜里同时到看守所汇报。我曾对郭科长说：“马尚虽然是中统的工运组长，可是他争取得不错，才判他有期徒刑七年。这次他在第8监号工作，反映情况也很好。他戴一个小脚镣，走路一点一点的挪动，太不方便，给他拿下来叫他方便方便吧！”郭科长说再等两天。可是哪会料到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马尚这次又枪毙了！我这个没有判刑的比马尚还严重的大特务，不也随时有被拉出去的可能吗？想到这，自己警告自己，应该知道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知道无情又能怎么办呢？我能对政府人员说，你们别来这一套，你们用完了我就要杀我的。

5月20日以后,犯人有走的,也有来的,看守所把我调到第一监房担任学习组长。

我仍然用“郭依平”这个化名。我到这屋干什么来了,看守战士都知道。这些哨兵都认识我,每逢在号内与别的犯人讲话的时候,哨兵看到也装作没看见。可是有一个班副姓傅,山东人,他对我最过不去,号内不准交头接耳谈话,可我为了要弄清问题,不能死坐着不动啊,我与隔壁的同犯一说话,被傅班副看见了,他对我严厉地批评了一番。我心想这是故意找别扭。我心中不服,对宋所长说了,宋所长说:“我回头告诉他,你还要继续工作。”

没有几天,刘荣第来了,他是从北京捕获解到长春的,关到了我这号。此外还有长春市立医院医生丛佩芝、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情报大队副张长青、哈尔滨工大学生门光第、东北大学学生潘澄、中统特务严新汉、现行反革命于宗元,也关在我这号。一屋子人。

刘荣第穿一套新布制服,脚上戴着小镣,虽然这种小镣仅比手铐子大一点,但是戴上极不方便,一步只有几寸长,行走不如一般的铁镣。进屋后,让他靠近厕所坐下。我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1948年3月,督察处把刘荣第和他老婆于凤茹逮捕了,因为于凤茹叫他外甥把一大批马列主义书籍拿到大街上当废纸卖,这一下被发现了。我亲自审讯于凤茹,陈牧审刘荣第,据刘荣第供称:“1946年4月八路军占长春时,三联书店租了我的房子,到5月23日,八路退出长春,三联书店退得匆促,把许多共产党的书籍扔下,放了一年多,我内人认为这些书没有用处,就叫我外甥当废纸卖,这一卖,被督察处知道了,这事,我不在家,是内人办的。”又有许多人对我和处长张国卿婉说,我们才把他们夫妇开释。我当时看见过刘荣第的背影,他不认识我。

我和刘荣第谈了一会儿,没告诉他我是什么人,我只说:“咱们在长春的罪恶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承认不承认,那是我们进步与顽固的问题,事实俱在,不承认并不等于没有。政府杀我们与不杀我们,不在我们多交一件罪恶,或少交一件罪恶,我们仿佛是一

列火车的货物，多放一包东西，少放一个行李，对整个这列火车无足轻重。我们的罪是很多的，不要顾虑这一件或那一件罪，要全交清，不交说明顽固，交了是进步，你就不要犹豫了，在长春认识你的人多，自己争取主动有好处。”

“我一定交清，这回我在北京看见镇压反革命，对我的教育很大。4月26日那天，我还未被捕，北京这一天枪毙200人，原来计划枪毙202个人。把202人装上汽车，便有两个人要交待问题，于是又把这两个人从汽车拉下来，就枪毙了200人。我心中想，只要能坦白，就能受到宽大，方才听你这一说，我一定全部交待，没问题。”

下午，郭科长找我问刘荣第的情况，我说：“他能交待全部问题，不是顽固蛋，把他戴的小镣子给下了吧。旧社会他是长春地面上的人物，戴着镣面子不好看，思想有负担，影响写材料。他认识的人多，还能检举许多人。”

“他主要职务是什么？”

“他是国民党东北党部的人，后来又与毕泽宇——吉林参议会议长，1948年挂名哈尔滨市市长相勾结，给毕泽宇摇旗呐喊，毕泽宇任他为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长春参议员，他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

刘荣第被下了脚镣。他写了不少材料，很能争取。

我们这屋，问题交待不少，丛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枪，他把他爸爸检举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这都是显著的进步。我自己认为也有一份工作成绩。

于宗元是个中学生，他只有19岁，去年冬，他与两个同学成立反共青年团，他是负责人，在长春市内各电影院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郭科长叫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人员及上级关系，两天之后，郭科长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赵处长也在座，赵处长对我说：“你很辛苦哇，健康还好吧？”

“报告处长，我的身体很好，处长好。”

他叫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郭科长从旁说：“于宗元的问题进行的怎么样？处长要了解一下。”

“于宗元是反共青年团的团长，另外一个同学是副团长，姓×，他家开一个木匠铺。他们写传单，开会都到这个同学家。还有一个瓦匠支持他们，但不是上级。一个同学加入了他这个反共青年团。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家也没有在国民党干事的，我看了一些侦探小说，见国民党接收人员很气派，认为不干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将来没有出息。同时，我认为共产党长不了，于是我与同学就成立反共青年团。’”

“有一些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处长摇摇头很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看应当把这个姓×的学生逮捕！”我没加思考，就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在沈阳与长春之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5月底，进监较晚。对这次大镇压，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4月26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里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多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而后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人，两次有200人。这两次我都

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那人们就会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霎时间就过去了。

敬 服

楼上10个组展开交待问题竞赛,每个小组长都很焦急,要走在前头,作出成绩,互不相让,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6组组长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个犯人交血债,没交血债,不叫吃饭,不给水喝,接着又开始打人,罚跪。打人的情形各组都听到,看到了,因为同在一个圆楼,没有前窗,只是铁栏杆。各屋的事别屋能听见,看见。我把打人的事对宋所长反映了,在宋所长还未制止的时候,第3号、10号、7号,也都接着打起人了。于是宋所长把十个组长集合到后院进行了批评,强调不许打人!打人犯

错误。宋所长虽然这么说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同犯交待问题,打几下没关系,因此依旧打下去,这样一来事情严重了。

我们第一组一直没有发生打人事件,我认为凭我这张嘴就能把对方说服,还用打?我在屋内对同犯说:“咱们这屋,交待问题还用打吗?我看用不着,打人的犯错误,被打的人也丢人,男子大汉有什么事敢承当,别说坦白了不会枪毙,就是枪毙了,又有什么关系?你不坦白不一样枪毙吗?”我利用别屋打人威胁本号的同犯,敦促同犯交待问题。

10号监房有一个叫姚汝纯的,是中学的数学教员,到过台湾。小组长沈重说姚汝纯利用中学教员作掩护,进行潜伏活动,但是姚汝纯不承认,于是沈重就动手打他,姚汝纯在小组挨打受气,成了“碉堡”,于是他承认:“我是台湾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我携带有一部电台,两个密本,电台放在香港,我计划去取,我在长春收集文化机关的情报……”

这个材料内中有许多漏洞,赵处长提姚汝纯亲自问话,姚汝纯照样说,经赵处长再三追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赵处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要有顾虑,可以对我说。”

姚汝纯把小组打人逼供的事一道出,于是赵处长知道了监号的一切情况。赵处长问郭科长,郭科长说:“有打人的事,但批评纠正了。”

当天晚上,郭科长到了圆楼,大喊大叫,把各组的学习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为什么打人?谁给你们的权?你们都是犯人,为什么把过去的那一套作风搬到这里来?损害政府的威信!打人的组长要进行自我检讨,现在宣布停止学习!”

第二天停止学习了,每个犯人都不得讲话。我心想,打人的事宋所长知道,他制止了,不过没有认真制止。郭科长对此也马马虎虎,看守战士每天看守犯人,各屋打人的事也看得到,都是有一半默许,才发生打人,逼供的事。这件事的出现,干部与犯人都有责

任。

停止学习的第三天，我们几个学习组长，除了沈重因负责挑饭仍住圆楼，其余八个学习组长都集中在小红楼楼下6号监房。这是个小黑房子，八个人挤在一块真够受，这是处分我们，小禁闭。

由这开始，来了许多男女干部，都穿藏青哗叽制服，每张面孔都异常严肃，找每个学习组长审问打人的事。

“谁叫你们打人的？”

“谁也没有叫，我自己打的。”

“你为什么打人？不知道打人犯法吗？”

“……”

一般都这样问答，只有我那组没打人，我的答话与以上不同，问我话的人是一个高个子干部。我既没有打人，他就询问别组情况，我尽知道的谈了一些。

讯问李中候的是一个女干部，有30多岁，板着面孔，问道：“你们谁先带头打的人？”

“我先带头打的人。”

“你把打人的方式及打了多少人，详细地谈一谈，要老实。”

李中候从头到尾谈了一遍。

最后女干部问：“你打人的目的是什么？”

“打人的目的是叫他交待问题。”

“打人之后，没有人制止你们吗？”

“宋所长制止了，我们没有听，我们还是打，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你是不是钻政府的空子，给政府造成损失，企图破坏政府的政策？”

“不是。”

每一个学习组长都问了多次，这样审问了三四天，才告一段落。我们背后议论，这些人是长春市委会的干部，有的犯人认识其中的人。

另一个下午,把我们学习组长及原来的学习副组长都集合到办公大楼的一个大审讯室里,有20人。不一会儿,龚副局长和一个穿衬衣的人来了。龚副局长问:“各学习组长,副组长都到齐了没有?”宋所长说到齐了。龚副局长讲话:“你们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犯人,在这次学习中,打人、逼供,这是特务行为,这与我们政策是相抵触的。我们对你们这种做法是不同意的,肯定说这也是错误的,有人钻政府人员的空子,企图不轨,这种行为是犯罪的。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纠正,这一点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到了外边,不准许把这些事乱讲,如果有人乱讲,就是犯错误!”谈到这,停了一下,看了我一下:“关梦龄!”

“有。”

“你谈谈这件事,怎么办?”

我说:“我们都是反革命罪犯,在监中利用学习机会,钻政府人员的空子,打骂同屋犯人,逼供,给政府造成重大的损失,破坏了政府的威信,因此有人从中煽动造谣,说政府指使打人。这是无中生有的诬蔑,我坚决反对!犯人学习组长打人骂人,应看作是监内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我说完了,龚副局长说:“关梦龄这样认识比较正确,你们都应当有这样的认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龚副局长讲完话,叫别的学习组长回去了,唯独把我留了下来,龚副局长说:“到那个屋子去,有人与你谈话。”

他下楼走了,我到了那个小屋子。方才穿衬衣的那个干部站在地中央,问我最近学习什么?我知道这是前言,不是本文,这些话他随便问,我也随便答,最后他问:“郭科长给你买过苹果没有?买过其他吃的东西没有?买几次?”

我如实说:“买过许多次,买过包子、苹果、香肠、花生等。”

“打人的事,郭科长看见过没有?”

“没看见过。”

又说了一些别的事,叫我回来了。这次谈话内容,我想是调查

郭科长给犯人买东西的开支,核对一下,是不是犯人真吃了这些东西?这真是,身子一虚,什么病都来了。犯人打犯人,郭科长犯了错误,这又有了贪污的嫌疑。我心中为郭科长犯错误而不快。我想,我没有给郭科长脸上抹灰,我对得起他。我是非常狡猾的特务,什么花招我都有,但我对郭科长没耍过手段,原因,他很年轻,口快心直,办事着急。我要留给他这样一个印象:关梦龄虽然是个老特务,但还老实,叫他办什么事,他努力去做,不会欺骗。所以,我写材料或反映情况,从没有半点不实之处。我看到的、听说的、我指挥别人做的、我自己在场看别人做的,都老老实实反映出来,并且一切都有分寸,从不糊里糊涂,故而郭科长相信我,因为有这些事实。

郭科长犯了错误,换了一个王科长。宋所长没有换。我们这屋八个人,王达生出去了解一个新来的犯人,走了;把李中候调到圆楼,蹲号去了,让他与一般犯人在号里坐着不准动。李中候这个人,不老实,乱七八糟,自己没有办法帮助同犯交待问题就带头打人,这回就坏在他身上。

10月上旬,看守所提我到前楼审讯室,审我的是我的盟兄弟高心鲁,头两个月我便从郭科长嘴里知道他升了科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坐在旁边。

高心鲁站起来与我握手,他说:“没有瘦,还胖了。”

“身体还好,老太爷老太太都好吗?”

“都好。才侠有信没有?”

“没有,我给她去过信,小孩子来过信。她们在徐州,还可以生活。”

“今天向你了解一个材料,国防部第二厅的问题……”最后,那个女干部出去了,我对高心鲁说:“这回郭科长犯错误,多可惜,我都不好受,你可千万别犯错误。负责任的人,稍一不慎,就可能犯错误。”

“我特别小心,不会犯错误。”

“我听人说,你在家还请客,这种作风要不得,不行呀,要节约

哇。”

“我找人吃顿饭你都知道？”

“有一个犯人住你对面，他说的。”

“是不是一个老头？”

“对了。”

我回来之后，感到高心鲁还是大手大脚的花钱，他吸的是有锡纸的香烟，这有多贵呀。我想起1948年高心鲁给第一兵团副官处长罗寿安行了贿，得到10万斤大豆加工成豆油的生意，按当时计算高心鲁可得70两黄金。他本没有加工厂，便将大豆卖了，折成豆油价格付给兵团。两天以后，郑洞国来了一个电报，不许把大豆加工成豆油，让把10万斤大豆作为军队的主食。罗寿安找高心鲁强迫他还大豆，高心鲁便携带全家老小出了长春，逃到解放区。临走之时找我给写了条子。没有我的条子出不了卡哨。为此罗寿安还放出空气，说“关梦龄私通八路！”想起这一段，看他现今的作风我替他担心。

自从镇反过去，敌我划清界限，干部也不与我握手了，说话也你我分清了；尚传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号内也不准吸烟了，现在完全是个犯人，没有两样。这时在我的心中又悲观起来，感到在共产党方面工作，只准有功，不准有过，有了过是不能原谅的，动一动就犯原则性的错误，真吓人！这回郭科长犯了错误，我的一切工作还不是随之完蛋，倒霉，用了多少脑筋，全部白费。

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号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没有过多要求我了解情况，只是叫我陪着，看来是担心此人寻短见。这是一个小老头，叫吴凤林，是长春人民法院院长杨超的岳父。吴凤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与杨超结婚，婚后，长春解放，杨超被派到长春充法院院长。杨超把岳父介绍到长春财政局工作，管采买。1951年从长春往北京天津两地运了一火车铁，卖后要吴凤林采买一批货物，吴凤林把铁卖掉，货买的不多，贪污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给检举了，吴凤林不坦白，经群众大会斗争，最后把

他送到这里。吴凤林以为自己是杨超的岳父，给他戴上大脚镣，心里很不好过。我们在一块，我不断地安慰他。

吴凤林说：“我本来在解放区做小买卖，女儿和杨超一定叫我到长春，这回可好，丢人现眼，怎么活呀！共产党这些人，什么感情也不讲呀，没有的事硬叫我承认，说到天津贪污了多少，他们到我家去搜，什么也没搜着，现在又给我戴上大镣子，我比反革命都厉害了，咳！”

我想，难怪吴凤林想不开，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国民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不行，莫说法院院长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样因贪污腐化予以撤职处分。这种事在国民党就行不通，一个省主席有了贪污，托人一活动就大事化小了。国民党是人事关系第一，人情大于王法。共产党这么办，我内心敬服！说到哪办到哪，不论是谁，法院院长的岳父不但坐牢，还要老老实实地坐。

楼上还有几个“特殊犯人”，住的是单号、铁床，吃的与我们也一样，吴凤林说：“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见一个干部好像是商业局局长，可能也是‘三反’^①进来的。”

我说：“现在‘三反’进来的多，楼下住一个姜处长，据说是长春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对他们优待一些。”

这次“三反”反下来这么多领导干部，真是想不到。“三反”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阵风过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越来越深。国民党能这样做吗？不能，如果这样干，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被反下来。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能“三反”呢？国民党的官离开本职，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因此，在当权之时一定要贪污搞钱，以备将来做“寓公”，否则单纯的廉洁奉公，到后来没有饭吃，无人过问。那时把这些廉洁奉公的人叫“傻瓜”。共产党的干部不需要贪污，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不会因为生活而发愁，只要给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会给你一定待遇，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到什么时候也“三反”不了，贪污也去掉不了。我

这么一想，反动派确是不行，私有制度产生一切坏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长找我谈话，问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说：“对‘三反’，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堕落，被糖衣炮弹打垮。这个运动国民党办不到，我从心眼里钦佩。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许多人贪了污，最后检讨了事，办得太轻了。”

王科长讲了一些道理，大意是这与镇反不同，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主要是教育，性质恶劣的，天津地委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大贪污犯也处死。又问我“五反”^②的认识，我按照思想，如实的谈出来，我认为干部受贿，商人负责任不大。汉口一个奸商给志愿军加工药棉，掺了脏棉花，对这个奸商枪毙也不过分，可是干部受贿，偏说奸商引诱，这就不公平，不能把责任都说是资本家向干部猖狂进攻，行贿与受贿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两者都有罪。无论怎么看这两个运动，对我都有教育作用。

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来到这里的日子够多了。从1948年到1952年，每个战士我都认识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甚至于家庭住址。这不用侦察手段，他们说话，从旁一听，今天听一句这个，明天听一句那个，凑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况。有时他们说话也不回避我。在伊通时，我教给他们说快板、唱小调，说呵，笑呵，我什么都知道了；哪个战士的脾气好，哪个班长的脾气坏，哪个战士有文化，哪个战士文化低，我都知道；每天他们上下岗，8至10点的班是谁，10到12点的班是谁？我都给他们列了一张“表”，要求大便时候，一看下一班是那个傅班副，脾气不好，好找我的麻烦，我就在这一班要求大便，因为这一班岗的战士好说话，以免到下一班，大便憋不住，不好办。

对干部也是这样,这么多审讯员经常找我了解情况,日子多了都很熟悉。我对这些审讯员也不是一律看待,于审讯员纸烟一吸,解放前后的材料一齐说,不用有顾忌;杨审讯员不吸烟,不多说话,他问一句我说一句,用不着多说;张审讯员找我到各监房做工作时,先表扬一番然后再交待任务;如果是肖审讯员找我谈话,我就对他谈些思想,因为他最年轻,很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他是共青团员,我愿意从他那吸收一些新东西。他很耐心,一个22岁的孩子,怎么有这样的素养?我看这与他的天性有关系,受共产党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在材料上、罪恶上绝对不夸大,不缩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们都相信。

公安局的干部也知道我这个犯人,有时别的干部来了解材料,见面就问事,不需要交待政策或警告,我知道这是局里的干部。局外的干部,一说话我就知道。1951年冬,沈阳公安机关来人审我,肖审讯员在旁边陪着,我一进屋,他叫我坐在很远的椅子上,一副严肃的面孔:“你叫什么?”“关梦龄。”“多大岁数?”“37岁。”我心想,这是例行公事。“在解放前干什么?怎么被捕的?……”

我一一答复,接着他又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给我讲了20分钟,接着警告我:“你要老老实实,知道的要交待出来。如果不老实,与你不利。”我心想,这是旧社会的评书馆,上场有定场诗、道白,最后才书归正传。我看了肖审讯员一眼,肖审讯员也不吱声。这位干部说话了:“有个张焕相你认识不?”我一惊异,怎么这样熟?“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伪满大汉奸!”肖审讯员从旁这样说。“认识,是我的亲戚。”我真想不到能问到张焕相,“什么亲戚?”“我的姑母是张焕相的嫂子,1930年张焕相在东北空军当司令,我父亲在那当军械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父亲在北平,张焕相也到北平,东北空军司令部在北平又成立起来。后来张学良出国,张焕相回东北当了汉奸,听说先当宪兵司令,以后到长春当大官……”“还有什么?”“我在十二三岁念中学时,只见过他一次面,到

了北平又见他第二面；他当汉奸，我在西北；我回到东北，他在苏联；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他认识我父亲。”“你父亲呢？”“1949年病死在北平。”“你把张焕相的历史、罪恶，他的财产写份材料，能不能写？”“能写，但是我知道得太少。”

类似这样的审讯很多很多，我抱这样一个态度：反正我是犯人，你说我听着，问我什么，我答复什么，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你不怕费时间，我更不怕费时间。

徐克成过去对我的一套待人接物很欣赏，如今他说：“正是因为你有两下子，罪恶才大，如果把这两下子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就好了。”

我说：“晚了，悔之晚矣。”

我问徐克成：“将来咱们怎么办？”

他说：“到一定时期就会释放，时间不会太久，一定会用咱们工作。”

“但愿如此，不过也不易呀。”

“为什么不易呢？”

“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这些审讯员对军统、中统的情况都不知道，可是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上一次有一个干部，年龄较大，可能科级以上干部，穿着呢子制服，提我了解重庆中美训练班的材料。他问我，中美合作所与中美训练班的关系，我告诉他是两件事，中美训练班是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处处长梅乐斯签订的合同。谈到中美特务勾结，这位干部说：‘现在我们知道的比你懂得多，我们掌握了全部匪特材料。’从这些话可以分析，咱们出去，不能在保卫工作上立功赎罪。现在也不需要咱们做什么了。”

“那还有别的工作呢，这么大个国家，什么不可以干。”

我认为什么时候出去还没有指望呢，还谈出去做什么工作！这简直是没有老婆就把小孩的名字给起了，笑话。

生活太苦了，每日两餐高粱米饭，白菜汤，总是这样。不好吃，没有营养。心想这样下去，押个十年八年，身体完了。不要求好的，

小米饭也好一些，豆油炖菜也可以，脂肪不够人的身体受不了。人作了罪犯什么也谈不到了。犯人聊天最喜欢谈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些人不但会吃，还会做，发表自己意见，互相考问。刘荣第父亲是开饭馆发家的，懂得满汉全席，俄国大菜，我在北平多年，一些大饭馆的厨房我都进去看过，什么吃的都吃过，大家一谈津津有味；其次就是谈女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电影明星、姨太太、交际花、某小姐，一谈没有完，谈到最后可能有人说：“别谈了，老说这些没好处，谈谈新东西。”大家异口同声说：“对，对。”

在生活上，我总结出来三句话：“少吃，多嚼，勤运动。”吃的不要太多，吃九成八成饱；多嚼，饭到嘴里，多加咀嚼，再咽下去，这样可以给胃减轻负担，消化器官不出毛病；勤运动，只要有机会就勤加活动，做体操、跑步，不能到外边散步，在屋里又不准，我便趁看守不在，钻空子跳一阵，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再坐下来，搞得浑身是汗。有时宋所长把我提到院中去活动 20 分钟，这也是特殊照顾。不过比 1949 年春天要好一些，在监号可以靠一靠，伸伸腿，与同屋的说话。后来我对宋所长建议：每天正午 12 时，应当准许犯人起来在各屋自行活动一会儿，这样对身体有益处。宋所长批准了。可是有的看守战士到时候不叫起来，那就不能活动了。不自由就是不自由，在屋想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 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发生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了，我才 37 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在徐州；1947年5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肖审讯员听了我的话，停了一下，他很犹豫地说：“王才侠要和你离婚，你同意吗？”

想不到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提出理由。”

“我没有理由，我出监无日，她比我年轻12岁，我不能贻误她的青春。不过我有一个女孩，今年7岁，名叫关棣。她嫁人可以，但不准给我的孩子改名——这样吧，我给她写封信，政府也可以把我的意思通知她，关棣暂由她教养，我出监之后由我去领。”

肖审讯员说：“可以，你写信吧。”

我拿起笔来，先写“才侠”，第一句话写什么呢？想了一下，写了下去，这封信的大意是：结婚以来，未能长期同居，又加继母心小，处事不当，婆媳不和在所难免。我因全家衣食奔波各处，对你未尽丈夫义务，对关棣未尽父亲的责任。效命蒋帮铸成大错，现在反省，出狱无期，你申请离婚，我完全同意，你的青春有待，不要贻误，女儿关棣暂请你代为教养，以候我获释之后，再去接领。

写完交给肖审讯员，他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叫我回来了。回到监狱，我心中十分难过，最近我给北京的表兄去信，没有回信，胞弟也不理我，把我的钱、衣物，完全吞搂，对才侠一文也不给，撵回徐州。自己做了犯人，亲不亲，友不友，夫妻不夫妻，兄弟不兄弟。一

切关系都建筑在国民党政权基础上,国民党垮台,这一切关系随之垮台了。人情冷暖莫如此甚。

我想起与王才侠结婚的经过,那时我是军统局安康查缉所所长,综管 11 个县的走私漏税的工作。王才侠父亲叫王悦珩,在河南洛阳,是红帮头子,也在东北军当过军人。他有一个女儿在洛阳中学念书,那年 17 岁,她叫王才侠。王悦珩与军统特务认识,华北办事处有一个秘书叫岳梓宇,是我的特务训练班同学,他占一个很重要地位。岳梓宇与王悦珩相识,王悦珩托岳梓宇给他女儿找个男人,条件有三:第一,不作妾;第二,东北人;第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不过 28 岁。岳梓宇说:“这个条件不容易找,有机会我尽力帮忙。”

有人对岳梓宇说:“关梦龄就够条件。”

岳梓宇一想也合适,他就给我去了一个急电:要事相商,速莅豫。

我不知什么事,马上到了洛阳。一见面,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太太。不打这样的电报,你不会来。这个人是你东北同乡,人很老实,不是你所喜欢的花花小姐,那些女人不能过日子。这个王才侠才 17 岁,家庭好,本人老实俭朴。”

我随岳梓宇到了王悦珩家中相看了一下,王才侠不怎么漂亮,但很老实。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和她秘密地订了婚。那时军统局特别规定,战时不准结婚,有结婚的查出来关押 5 年。在西安一个会上,戴笠当场宣布,一对私自结婚的特务姜维世和陈友桂关押 5 年。所以均采取秘密结婚,或者说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的婚姻。1944 年 12 月我与王才侠在西安秘密结婚,1946 年 1 月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关棣。“九·三”胜利后,王悦珩到徐州开投机买卖,叫大同商行,直到徐州解放。

王才侠不好打扮,人又老实,我不愿与她出去,所以 1947 年春到沈阳,我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她叫郭依平。这些事都是不对的,自己反了革命对不起她们,现在闹得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对人民不

忠,对父母不孝,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人间,真是惭愧!

现在眼前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既不杀,也不放。关于死,在我脑子里倒不成问题,可是放没有希望。想起来,从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长春,一共是8个人,这8个人中翟丕翕、杨绍林枪毙了;以后搬到楼下7号,张逸民与我同屋,他也被枪毙了;后来把军统特务集中写材料,一共十个人,先枪毙的印匡时,接着李秉一、张锡德、张兆丰、刘文白、孙静修、陈青波、李海涛也都枪毙了;1949年底,被优待集中到楼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我和一个日本人,李芳春有现行活动没交待,送到监狱也被枪毙了;1950年冬到伊通县公安局去了16个人,其中被枪毙的有王乃臣、王寿昌、张子文和蒙古特务;这回镇反,又有一批人被枪毙,长春解放一周年,二周年都枪毙人……经过多少次“过筛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对我是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不应当考虑死的问题,我应当考虑活。可是我怎么活呢?希望什么呢?目前没有希望,只好在这坐着,连洗脸的肥皂都没有,牙刷、牙粉、牙膏什么也没有,从1948年冬到现在没刷过牙。讲卫生那是谈不到的。这些事还不能请求,耐时顺守,等着吧。

此后,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来头一次听到的:在犯人放便时,有一个犯人认为粪坑这个墙角通大街,墙角边有棵大树,一上大树就可以逃跑,于是他一翻身上了大树,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他在里边不知道外面还有看押的战士。听说挨这一枪很危险。当时我在屋看书,听枪声我以为枪走火了,后来听挑饭犯人一说,我才明白。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想跑?跑不脱的。这样的人绝不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自己认为无所谓,反革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样简单,跑出这个院子,又到哪去?社会上谁敢收留?街坊邻居能不检举吗?我知道反革命分子人人怕,谁也不敢沾,沾上了就麻烦,反革命成了毒蛇猛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月8日这天,吃完早饭,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对徐克成说:“下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黄继光这些人。”

“一个战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为什么下半旗呢?”

我在屋内坐着,王科长在我窗前站下说:“斯大林元帅死了,你们知道吗?”

不一会儿报纸送来了,斯大林大元帅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想,这回完了,国际共产主义群龙无首了。什么病呢?报纸上报道了。我想苏联科学这么进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谁能把斯大林救活,这个功劳可大了。咳,斯大林一死,帝国主义一定高兴。斯大林死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没有问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战友,很负众望。

3月10日,午前提我与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长说:“现在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改造,那里有劳动。政府考虑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谈一谈。”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写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这是推完磨杀驴,我不答应也不行啊,我又转变了口气说:“我在市局这么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殊宽大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内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后一定努力争取。”

王科长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又问:“你还有衣服吗?”

我没有说话,王所长抢着说:“再给他拿一套衬衣,拿一双新鞋。”这次押走的有我、徐克成,还有一个是一贯道的“皇帝”,有80岁,再一个是特务腿子,斜眼。临出门时,我对王所长说:“戴点东西吧!”

“戴什么东西?”王所长莫名其妙地问。

“铐子。”

“走吧!”王所长和王科长都笑了。

①三反:从1951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②五反：1952年初开始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